



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 日本学者论集

HAIWAI ZHONGGUO SHUILISHI YANJIU
RIBEN XUEZHE LUNJI

钞晓鸿/主编 



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 日本学者论集

HAIWAI ZHONGGUO SHUILISHI YANJIU
RIBEN XUEZHE LUNJI

钊晓鸿/主编 

责任编辑:赵圣涛
封面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吴晓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日本学者论集/钞晓鸿 主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01-013944-9

I. ①海… II. ①钞… III. ①水利史-中国-文集 IV. ①TV-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5481 号

海外中国水利史研究:日本学者论集

HAIWAI ZHONGGUO SHUILISHI YANJIU; RIBEN XUEZHE LUNJI

钞晓鸿 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34

字数:600 千字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978-7-01-013944-9 定价:8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本论集的翻译出版得到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厦门大学：项目号20122210010)

编译说明

本论文集由日文各论著翻译而来,谨就编辑、翻译事项说明如下。

一、史料。日文论著中,对于中文原始文献,或直接引用,或译为日文引用。此次译为中文时,前者保留原貌,仅对个别明显疏误有所订正;后者则将日文直译为中文,尚未还原为原始文献。

二、标点。译文中一般行文,按照中文要求使用各类标点;但原始文献,一般以日文原著的句读为准。

三、图表。囿于篇幅及技术处理,删略原文中部分图表及照片,并在文中适当位置加以说明。表格样式亦有所调整。

四、行文。译文横排编辑,对竖排惯用词汇进行了相应技术处理。日文题名中的“支那”等字样保持原貌,读者自可甄别。日文标题的等级标识及个别文字,译为中文时有所改动。

五、数字。传统纪年方式一般保持不变,公元纪年及其他数据则使用阿拉伯数字。

六、注释。原文多用尾注,此次均改为脚注,每页重新编号。原注中承前省的注释,译文以适当文字加以明确或贯通。各文注释详略不一系原文所致。引用的中文书刊,使用中文注释格式;外文书刊,一般保留原文注释格式。

七、勘误。编辑过程中,对于个别疏误或歧义之处稍加订正、说明。

本论集的编辑翻译,得到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前会长松田吉郎教授、留日博士生赵从胜以及各位翻译者的鼎力襄助。主编对各文的体例格式、标点、部分史料等进行了编辑与核对,并负责全书的统编工作。

导 言

钞晓鸿

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机制健全,成果丰硕,对于深化中国水利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借鉴意义。本论集主要以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为线索,浓缩汇集几代学人的研究成就。

一

作为现代学术,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据笔者管见,较早的著作可以追溯到小越平陆的《黄河治水》,1929年由政教社出版。而学有传承且被发扬光大的则是池田静夫的《支那水利地理史研究》及其与冈崎文夫合作的《江南文化开发史》,1940年分别由生活社、弘文堂书房出版。受其熏陶影响,佐藤武敏等人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并在健全机制方面迈出了关键步伐。

1965年,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编辑发行学术期刊《中国水利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其组织与倡导者好井隆司、佐藤武敏、长濑守和森田明4人的专题论文。时至今日,研究会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杂志已发行至第42号(2013),佐藤武敏、森田明、西冈弘晃、松田吉郎、藤田胜久先后担任研究会会长(代表者)并主持编辑《中国水利史研究》。研究会的学术活动井然有序,一般每年举办一次中国水利史研究大会,每次通常只有三四位学者(偶尔也邀请中国学者)发表学术演讲,大会据以进行认真讨论,其中有的演讲论文即在最新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上发表。

以笔者浅见并综合业界观点,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学术交流与最新成果

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的学术交流逐渐增多,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员积极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会议。1980年8月,“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川胜守等人参会,并提交了水利史

方面的论文。当年11月在大阪举行的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大会上,即由川胜守报告天津的此次学术讨论会情况。1982年,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在四川灌县会议上宣告成立。当年10月,佐藤武敏、长濑守和森田明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并获赠一批中国水利史研究论著与相关刊物;次月在大阪召开的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大会上,即由佐藤武敏作研究会访华报告。这一参加在中国举办的学术会议、及时掌握并发布相关动态的传统保留至今,例如2011年10月在大阪府立狭山池博物馆召开的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大会上,即由当时任职于早稻田大学的井黑忍报告在福建召开的“明清以来的环境变迁与水利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情况。

对于某些重要论著,则及时地译为日文发表。学贯中西且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冀朝鼎,1936年出版了英文名著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日译本即于1939年发行。郑肇经的《中国水利史》,1937年由上海书店出版,日译本即在1941年发行。而在《中国水利史研究》等刊物上,则刊发介绍中国的最新成果、研究动态的文章。某些中文、英文、韩文的重要文章,著名学者山根幸夫、森田明、原宗子等人亲自执笔,翻译后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东洋史访》等刊物上发表。

(二) 关心已有成果与学术史

学术史是现代学术的应有之意,是深化研究的必要环节。在该方面,不仅日本的中国水利史论著回顾了各自的研究专题,而且整个水利史学界亦十分重视总体的学术脉络,细致搜集、编辑公布研究论著目录就是体现之一。在中日尚未邦交之前,《中国水利史研究》第4号(1970)就刊载《中国水利史文献目录稿》,分别由吉冈义信、长濑守整理宋元时期,森田明整理明清时期;后来,藤田胜久又补充汇总了其它古代部分,并于《中国水利史研究》第10号(1980)发表,从而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汇集了二十世纪的中日两国水利史论著目录。

此后这种工作还在继续。藤田胜久根据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访华时所获书刊资料,在《中国水利史研究》第13号(1983)刊发文章,介绍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以及相关书刊中的论文内容,还从相关资料中摘录出水利史的论著目录。随后,松田吉郎在《中国水利史研究》第15号(1985)发表文章,逐一介绍《中国水利》、《农业考古》、《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等书刊中的论文内容。后来两人又与小野泰合作,在《中国水利史研究》第17号(1987)刊发文章,根据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访问中国并参加在广西灵渠召开的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研究会第二次大会所获书刊资料,就有关水利史专题的已有成果、80年代中国各类书刊中的水利史论文等进行了总结与汇编。

(三) 注重史料及其解读

日本学界对于汉籍的搜集解读十分重视,从一些论著可以看出,作者力图在当时的条件下穷尽本专题的所有史料,对其归类排列,研读分析,然后提出观点见解。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员翻译、注释了大量水利史料,《中国水利史研究》所反映的信息主要有:

编辑水利史料。在1972年11月的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大会上,计划编辑《中国水利要籍丛编》,后来付诸实施并在《社会文化史学》第15-19号上(1978-1982)连载,对各史料进行摘要介绍。

译注正史中的水利专志。藤田胜久译注《汉书·沟洫志》,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上分4次刊登。伊藤敏雄、町田隆吉、森胜彦译注《宋史·河渠志》,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上分6次刊载,其中后来的作者署名为“宋史河渠志研究会”。“清史稿河渠志译注会”译注《清史稿·河渠志》,在《中国水利史研究》上分5次刊发。

另外,注释、研究其它各种水利文献,或与水利密切相关文献,如《新唐书·地理志》、《水经注》、唐代的《水部式》、《洪洞县水利志补》以及王祯《农书》中的灌溉内容等等。

(四) 关注水利史的同时关切水利社会

根据个人兴趣与主攻方向,日本学者的中国水利史论著基本是以断代与专题为主,不过,《中国水利史研究》亦刊发过江南的水利开发、中国农书与水利史、黄河水利史、都市水利、蓄水灌溉以及中日水利史的特征等专集。从其所刊发论著的分类来看,水利史的研究内容包括:总论,治水,农业水利,都市水利,海塘,水能利用,水利技术,水利的机构、管理、运营,地理环境,地域开发,水利社会等等。据藤田胜久的概括,二战之前,水利史研究以水利地理史和水利政策史为主轴,二战后主要从社会经济史观点出发进行考察。上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对水利共同体的论争告一段落,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逐渐迈入实证阶段,以治水、灌溉、城市水利、海塘等为对象,将作为社会及生产功能的水利运行、管理作为主要研究视点。可见,治水仅为日本中国水利史研究的一小部分,既非主体,亦非其旨趣所在。

事实上,在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成立之初,就汇集了对中国水利史、农业史、社会史感兴趣的一批学者。根据小野泰的概括,当时成立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其出发点就是通过水利,更深入地考察中国社会与历史这一共同认识。由此观之,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并非囿于实证案例,其主旨更在于通过水利

社会的分析,透析中国历史与社会的演变轨迹。

二

日本的中国水利史研究会除发行《中国水利史研究》期刊之外,还编辑了论文集:《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佐藤博士退官纪念中国水利史论丛》以及《中国水利史的研究:中国水利史研究会创立三十周年纪念》,由国书刊行会分别于1981、1984、1995年出版。

本论集的绝大部分论文,就是从上述书刊中选译而来,其它则是学者的代表作或尚未刊发的新作。从其中最早的一篇1956年刊发,到新作在本论集中首次发表,前后跨度几近60年,浓缩了日本几代学人中国水利史的研究成就。

所译论著内容广泛,为了系统起见,笔者不揣浅陋,将其划分为数个专题。当然,有些文章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各专题之内。试将各文的要旨分类说明如下。

(一)理论与方法

水利史有不同的研究范式与理论,其中日本的“水利共同体”理论在国际学术界影响较大。在战后日本学界,关于水利共同体就存在诸多争议,并在五十年代形成激烈争鸣,直至今天对其质疑并未停止(如滨岛敦俊近年就持否定论)。

丰岛静英主要以山西、绥远二省为例,考察“水利共同体”的结构、管理控制及其没落解体。该文从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的土地所有制、政府举办公工程的职能等论断出发,通过分析中国历史上的所谓“水利共同体”,探讨社会形态、社会演进与改造问题,其落脚点实际是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

好并隆司批评丰岛使用德国的共同体理论,在方法上缺少充分的主体性,实际是一元论;提及江原正昭和宫坂宏主张将村落与水利组织分开,此为二元论。好并在其论著中结合各朝代的社会经济状况,纵论法律与惯行、国家与村落在水利管理、运行中的作用及其变化。

关于学术史,例如东汉至唐中期黄河是否安流?其原因何在?滨川荣细致梳理了1962年以来学界的有关争论、分歧以及各自解释,从史料与史实认定、水利专书与正史及其体例等方面支持谭其骧的安流说,但对其形成原因却并不看重农业、畜牧业之间的分野,提出应将研究重心由黄河是否安流,转移到在此背景下人们的应对、生活与感受,此正反映了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取向。

在方法方面,南埜猛以浙江宁波为例研究建国后的中国水利,将宁波与日

本的兵库县进行比较,利用了大量统计数据,不仅说明水利实况,而且总结出两地水利的共性、宁波水利的特征。文末根据日本经验及宁波经济、人口等发展趋势,展望其未来的水利开发及其方向。

(二) 史料发掘与解读利用

以前研究四川盆地的水利开发多以都江堰为中心,史料丰富;而丘陵地区较少受到关注,史书的记载亦相对较少。大川裕子利用考古与实物资料,并与平原进行比较,考察秦汉时期四川盆地丘陵地区的水利开发,强调其与平原在水利建设方面的差异性,揭示水利开发的地域性及多彩风貌。

佐藤武敏使用常见史料,细致梳理分析,得出了新的认识。与一般所认为的王景治水是以黄河为主不同,佐藤认为是以被称作浚仪渠、汴渠、汧渠等渠的治理为主。《后汉书·明帝纪》“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后汉书·王景传》“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并非前人理解的从荥阳至千乘入海口都修筑堤防,而应理解为,完成汴渠的修复方使黄河可以从荥阳东流至千乘的入海口;水门也不是从荥阳至千乘每10里就设置一道,而是设置从汴渠特别是汴口至浚仪一段。该文可与上揭谭其骧说一文相互参阅。

其它文献方面,町田隆吉基于出土文书,对五世纪吐鲁番灌溉进行了细致的文本分析与推测,考察了灌溉管理的机构、官职、职责、用水分配、劳动力,并通过文本解读反映地方政权的沿革变化。

山口荣通过比较胡适关于《水经注》研究的不同版本,肯定了胡适在《水经注》研究方面的贡献,包括胡氏否定所谓戴震抄袭赵一清《水经注》研究之说。另外,山口透过1979年赵俪生等人对胡适学术重新定位、加以认同,敏锐地捕捉到中国大陆学术氛围的变化,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于文献精于求证的精神和对于学术动向的关注。

(三) 水学实践及技术交流

西冈弘晃研究宋代苏州昆山、常熟两县塘浦的开浚与管理,围田构筑情况,以及国家的政策取向与角色。苏州水利面临着低地排水与高地灌溉的矛盾对立,为解决此类问题,“水学”得以繁盛,其中就包括北宋末期的赵霖,提出应将开浦置闸与围田政策并行推进,但考虑到后者对于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的潜在影响,在政策的导向上水利兴修则优先于围田构筑,并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乡村的原有体制。

长濑守详细论说贾鲁的治河思想、技术内容。前者有治河论、疏浚论、治堤论、沉舟论;后者包括疏浚故道及减水河、塞河及塞堤、治堤、埽堤、石缸堤、河役

与资材等。另外,关于贾鲁河工与元末红巾军起义之间的关系,长濑从表里两个方面来解说,认为治河本身与红巾军起义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却对反叛规模的扩大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现代水利工程,美国人塔德(O. J. Todd)作为华洋义赈会要员实施了1931—1932年渭北水利即泾惠渠工程;陕西蒲城人李仪祉,被誉为践行西洋水利土木技术的第一人,正是该工程的倡导者与负责人之一。川井悟分析比较在修建泾惠渠的过程中,二人将西方工程技术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不同侧重点:塔德青睐低廉的人工劳动,以较少资金投入修建大型水利工程;李仪祉则重视引进西方水利技术,关心工程成效及水利组织管理的近代化。

村松弘一以淮河流域的芍陂(即现在安丰塘水库)为例探讨东亚的水利交流史,考察其取水与筑堤的具体方法以及蓄水防洪功能。该工程在《左传》中已有记载,是东亚最早利用草土法(敷叶施工方法)建造的水利工程,在东亚水利技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对韩国、日本同类水利工程可能具有先导作用。

(四) 城镇水利及河道整治

中村圭尔研究六朝时期水运与建康城的内部构造及其功能,具体考察了水路和水路运输网,指出在该城形成过程中,宫城特别是居住区受水路的影响很大,而且水运也促进了商业繁荣。中村主张,城市研究需要与周边地区、城内居民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

川胜守细致考察宋元明时期长江三角洲市镇及其格局变化,就曾揭示其与水运及周边地区社会经济之间的有机联系。文章最后还利用尊经阁文库所藏《水陆路程》,详细地梳理了长江三角洲的水运路线。

森田明不仅利用水利账册,而且将水利与城市经济、社会结构与组织、国家的赋役财政相联系。指出水道管理、浚河事业与清代常州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常州的浚河事业在明末清初之前具有徭役性质,康熙至嘉庆年间基本以官项支出为主,道光以后对捐助的依存度增大,至清末捐费已占浚河经费的绝大部分,堂绅和善堂在经费的筹措运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水运航道方面,清代中期,商人李本忠整治四川夔州巫山到湖北归州东湖的长江航道,共达48处,所有费用及工程的督导管理均由李本忠及其协助者来完成。森永恭代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受财政困难影响,官府承担的公益事业逐步地转移到民间来运营。

(五) 水利与地域社会

藤田胜久认为,考察古代关中的水利事业,除了地理条件之外,还需将水利

机构、社会基础与具体的开发过程相联系。文章揭示了战国秦时期的水利事业与郡县制形成之间的紧密联系,统辖数县实施大规模水利事业的行政机构已经确立,郑国渠的开凿才成为可能,具体来说,郑国渠的开凿是在内史的统辖下,集合了县的劳动力、财政才得以实现的。

与藤田胜久从财政与交通体系出发、围绕郡县制所进行的上述研究不同,鹤见和幸则从整体上通过论证地域以把握多元中国的社会历史变化,在列举河川共有机能的基础上,确认河川水系对地域社会形成所提供的重要空间。文章具体考察了古代各水系的治水灌溉、祭祀、盟誓、交通、防卫、资源等问题,揭示多元的地域社会向古代专制国家的形成过程,指出河流祭祀与政治支配权是相辅相成的。

藤川和俊探讨钜鹿郡的地域社会特点,揭示地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文章以漳水为例考察赵、中山之间的“风俗”形成。漳水发挥着灌溉、水上交通功能,游侠作为水上交通的责任者,在地域社会中拥有巨大权力。由于各有所需,所以形成了游侠、豪族、商人以及诸侯王的联合,赵、中山间的地域风俗就是在此社会集团的影响下成立的。

小野泰主要结合地域社会来研究宋代黄岩平原的开发,具体考察官河水系的浚河、置闸事业与乡居的官员士人之间的联系,与水利事业有关的人物构成及其关系。文章认为,为了管理及维系乡党社会,“义役”出现并被实施下来,由此展望明清时期的水利社会变迁,即随着乡绅支配的确立,水利建设管理的中心人物也从地方官员逐渐向乡绅阶层转移。

(六) 水利开发、运行及管理

曹魏的屯田与水利开发,学界分为民屯和军屯来探讨,二者分属不同的制度体系和机构。民屯即典农部的屯田,而军屯分属度支尚书体系和都督体系。伊藤敏雄对该时期典农部屯田与水利、军屯与水利,分别从人员构成、机能特别是制度方面进行了细致分析。

本田治以上虞县北部平原的人工湖——夏盖湖为例,探讨湖泊水利开发史,强调行政决策对于夏盖湖存亡的决定性影响。文章分别考察了平原开发,宋元时的夏盖湖水利、湖田化、废湖经过等及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指出夏盖湖的水利组织非常依赖于国家行政,清代的海水入侵及湖田解禁开发,导致该湖在光绪年间名存实亡。

滨岛敦俊以明代的江南为例,探讨土地开发的地域、程度、阶段性与水利兴修、维护方式之间的有机联系。概言之,由根据毗邻水利设施的各户田地宽度的“田头制”,转为根据各户整个田地数量的“照田派役制”。前者反映了圩围

内部未完全开发,对于水利的利用及其受益程度不同,后者则是圩围内部全部耕地化,这正是照田派役制的实施前提。

松田吉郎以明清鄞县城乡水利为例,考察国家、乡绅、水利户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纵向变化。大致说来,明末清初以降,当地水利的修筑、日常管理以及运营,逐渐由国家转向了乡绅和水利户,这与里甲制的解体、商业资本的发展相辅相成。文章还将这一论证及今后所欲解决的问题,置于水利共同体的框架之内加以认识。

虽然晚近以来民间在水利事业中占具重要位置,但不尽然,晚清的天津小站营田水利为官方管理农田水利提供了宝贵信息。马场毅对此进行了研究,细致地考察了从周盛传创建时期到1940年代的变迁,主要讨论了管理机构及其职能演变、营田性质与归属的变化、水利环境的恶化、水源短缺、水利冲突等等。

(七)水利与政治及环境

薄井俊二对于东汉朝廷、郡国层面的治水实践、水利以及救济政策及其落实情况进行了纵向探讨。另外,关于君主、三公承担水灾责任及其变化,薄井指出,对于三公的处置,重要的不是御灾实效问题,而是从礼教出发承担灾害责任这一本质问题。

上谷浩一以自然灾害为线索,对东汉的宦官、外戚专权进行了细致梳理和重新解释,揭示了自然灾害与皇权、官僚政治、党锢事件之间的对应关系。文章从儒家官僚中抽象出“刷新派”概念,指出党锢事件实际是被严重自然灾害所驱使的“刷新派”同皇帝之间的冲突;“刷新派”官僚的严厉批判导致皇帝信赖宦官,其与皇权、外戚、宦官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当时的灾害频繁、人口死伤流亡这一自然灾害背景存在着密切关系。

井黑忍以山西吕梁山脉南麓的灌溉为例,探讨清、浊灌溉方式对水环境的适应性,揭示人类如何适应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文章通过实地考察、利用丰富的水利碑文,考察当地使用泉水(清水)和雨水(浊水)的具体情况,指出明代以来,清浊灌溉方式在当地长期维持,得益于人们对地域、水源差异的有效掌控,以及个人、村庄间通过水利契约而实现的水资源交易。

宫寄洋一从开发与环境视角探讨清代前期的山西水利特别是治水、水灾问题。文章考察了洪水发生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揭示过度开发改变了河川的自然状态,占据河岸的田地房舍加深了洪水的危害程度,河流上水磨的设置、向河川丢弃煤渣废弃物等也诱发了河水泛滥,当时有识之士对此已有认识并加以治理。此外还提醒人们,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自然就会反馈甚至报复人类。

以上只是对各文的简要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另外,作为学术问题及特定条件下的作品,有的论著在行文、史料解读以至观点认识方面可能存在不足甚至错误,相信读者自能鉴别,并在今后的讨论争鸣中推进学术的进步。

目 录

编译说明	1
------------	---

导言	1
----------	---

一、理论与方法

关于中国西北部的水利共同体	丰岛静英 / 1
中国水利史研究论考	好并隆司 / 22
汉唐期间河灾的减少及其原因——围绕谭其骧说的最近议论	滨川荣 / 36
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中国之水利开发——以浙江省宁波市与兵库县 的比较考察为例	南埜猛 / 58

二、史料发掘与解读利用

由水利开发来看秦汉时代的四川盆地——平原地区和丘陵地区的 比较	大川裕子 / 68
关于王景治水	佐藤武敏 / 81
关于五世纪吐鲁番盆地的灌溉——对于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初步考察	町田隆吉 / 96
关于胡适的《水经注》研究	山口荣 / 113

三、水学实践及技术交流

宋代苏州的浦塘管理和围田构筑	西冈弘晃 / 132
元代贾鲁的水利学	长濑守 / 158
塔德和李仪祉——关于中国近代水利土木工程的备忘录	川井悟 / 183
淮河流域的水利技术与东亚区域史——以安徽省芍陂为中心	村松弘一 / 201

四、城镇水利及河道整治

- 建康和水运 中村圭尔 / 208
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发展和水利 川胜守 / 223
关于清代常州的浚河事业 森田明 / 245
关于长江三峡的航道整治事业——李本忠和《平滩纪略》 森永恭代 / 265

五、水利与地域社会

- 古代中国的关中开发——对于郡县制形成过程的一次考察
..... 藤田胜久 / 284
中国古代的水系和地域权力 鹤间和幸 / 305
中国古代的交通和地域社会——以钜鹿郡的风俗为线索 藤川和俊 / 322
宋代浙东的地域社会和水利——关于台州黄岩县的事例 小野泰 / 339

六、水利开发、运行及管理

- 曹魏屯田和水利事业 伊藤敏雄 / 357
关于宋元时代的夏盖湖水利 本田治 / 377
土地开发与客商活动——明代中期江南地主之投资活动 滨岛敦俊 / 393
明清时代浙江鄞县的水利事业 松田吉郎 / 417
近代天津小站营田的水利 马场毅 / 447

七、水利与政治及环境

- 后汉治水、水利史研究序说——以后汉国家的水灾对应为中心
..... 薄井俊二 / 461
后汉时代中后期的自然灾害与党锢事件 上谷浩一 / 475
清浊灌溉方式所具有的对水环境问题的适应性——以中国山西
吕梁山脉南麓的历史事例为中心 井黑忍 / 487
清代山西省的水利行政和环境 宫寄洋一 / 512

关于中国西北部的水利共同体

丰岛静英

—

马克思曾经在亚洲的土地所有和灌溉事业中找出了“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共同体在亚洲的形态,^①之后虽然对于这把钥匙的作用进行了诸多说明,但特别是在中国,如何具体地使用这把钥匙来解明中国社会的本质现象所做的努力还不够。另一方面关于近代的中国,至少是在华北地区还出现对“共同体”的存在本身开始质疑的倾向。^②最近,大塚久雄先生,主要从西欧中世纪的共同体研究出发,提出了像我国这样的农村共同体广泛存在的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中,“从共同体制约中解放出来”是不可避免的必经之路这样关于共同体的问题。^③马克思在分析俄罗斯的共同体时,明确了其两面性(集团的要素——耕地的共有等,共有财产及其滋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的要素——私有的房屋,耕地的分割耕作及其收获成果的占有),认为通过使集团要素胜出,这个共同体“可以成为迈向近代社会所追求的经济制度的直接的出发点”。^④这是在对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向新社会迈进的时候首先要破坏共同体的各种关系,资本主义必须健全发展的思想进行批评而论述的,曾是半封建制的中国农村社会,现在经过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正风暴般展开一步步向社会主义方向迈进,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对中国农村共同体的问题——半封建制中国的农村共同体,或者说共同体的习俗的广泛存在和起到的人民革命胜利的条件

① 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への手紙》1853年,大月書店版,《マルクス・エンゲルス選集》第8巻下,pp. 456-459。

② 旗田巍:《中国における「共同体」をいかに把握するか》,1954年10月,《現代中国》第30号。

③ 大塚久雄:《共同体をどう問題とするか》昭和31年3月,《世界》第123号;《共同体規制からの解放》,昭和31年3月及4月,《世界》第124号。

④ マルクス:《ヴェ・ザスリーッジへの手紙》1881年,《選集》第13巻,pp. 193,198,204,209,210。